

中央农业学校——

党创建的第一所半工半读农业干部学校

□ 唐 雷

1933年，在江西瑞金城东郊的东山寺，中国共产党创建了第一所半工半读的农业干部学校——中央农业学校。学校兼具人才培养、科学试验和技术推广的多重功能，在1年零7个月的办学历程中，为苏区农业建设培育了一大批专业干部和技术人才，成为党的干部教育历史篇章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苏区建设培养农业干部和农业技术人才

1933年初，中央苏区在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各项事业进入发展时期，迫切需要各类优秀干部和专业人才。在农业领域，为提升农业生产能力、总结推广农业发展经验，并协助苏维埃政府规划苏区的农业建设，中共中央决定创办一所培养农业干部和农业专业技术人才的学校。1933年3月，中央农业学校在江西瑞金城东的东山寺创立，徐特立担任校长，学校施行半天学习、半天劳动的制度，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半工半读的农业干部学校。

中央农业学校直属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设校长1人，由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直接任命，主持全校事务。同时，在校长领导下设管理委员会，委员会主任由校长担任，其余委员由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和中央土地人民委员部委任。经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订定的《中央农业学校简章》明确了学校的办学定位，具体包括三项：一是培养农业建设中下级干部；二是搜集苏区农民群众经验和农事试验场的经验，加以科学的整理，广泛进行一般农业技术传播；三是与中央土地人民委员部建设局密切联系，计划苏区的农业建设。

中央农业学校第一期招生200名，开设本科、预科和教员研究班三个班次。本科1年毕业，并可根据实际需要缩短或延长学制，开设政治常识、科学常识和农业知识三类教学课程。政治常识包括最基本的政治常识和苏维埃建设的实际问题。科学常识包括气候常识、植物生理和病理知识、简易测量和算术常识等。农业知识包括苏区主要农作物栽培法、育种法、病虫害防治，主要肥料的制作、保存和施用

法，作物概论等7项具体内容。预科班修业期限为2个月，要求学生通过实习掌握简单农业常识，学习农业上必要的文字及算术。教员研究班没有固定修业期限，是由教员组成的农业科研机构，依据苏区经济条件开展农业科学实验和农业技术推广。中央农业学校的招生对象包括农民、农业工人以及有志愿学习农业的公民，年龄要求在上16岁至32岁之间，不限性别。学生入学必须由中央土地人民委员部介绍，毕业后则由中央土地人民委员部分配工作。学校注重校长领导下的学生自我管理，设立了学生公社，由全体学生大会选举委员会来领导和管理学生事务。结合中央苏区革命斗争实际，学校要求全体学生和工作人员加入赤卫军、少先队，并进行经常性的军事训练。

教学过程与农业生产实际紧密结合

中央农业学校从农业教学的规律出发，注重知识传授与生产实践的同步互动。《中央农业学校简章》强调，学习农业知识要“以实习为中心”，将教学全过程与农业生产相结合。为了促进教学，学校结合农业生产应用性强的特征，在瑞金设立了农事试验场和农产品展览所。试验场和展览所既是学生劳动实习和学习农业知识的基地，同时又是农业科学研究试验和推广农业先进技术的场所。具体的实施举措包括：通过分析试验场和展览所的试验、研究成果，定期向苏区农民群众作报告；随时纠正苏区农民群众在农田作业方法上的错误，并将这些纠错措施用于教育群众和学生；通过试验搜集筛选优良的农作物种子，积累育种经验，并在群众中推广；通过总结农民在农作物病虫害防治上的经验，提炼出具体有效的防治方法；在对苏区主要农作物调查的基础上，编制和公布农作物耕种与收获日历，为农民群众提供农时参考；通过试验场和展览所使学生从实际方面学习必要的农业知识。

校长徐特立在教材编写上下了很大功夫。结合中央苏区农村生产生活实际，他亲自编写了教科书《农业常识》和教学参考书《植棉经验说明》，并特别强调了中央农

业学校的课本编辑原则：一是要“以我们目前环境需要和物质条件可能者为标准”来选择教材；二是要“从个别的问题开始进到一般的原则”来编排教材；三是要灵活运用课本知识。他指出，由于不同地方的土壤和气候条件各异，因此“到处有他特殊的耕种方法，简单的课本不能把一切方法包括在内”。他要求中央农业学校教员根据苏区各地具体情况对教材不断完善补充，“但不能违反科学原则”。1934年6月，《农业常识》课本由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编审局印刷，分上、下两册。上册包括水稻、棉花、甘薯、甘蔗、豇豆等农作物知识，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知识，猪、牛、鸡鸭等动物饲养知识，共计26课；下册以农作物栽培管理为主，每课后均设置了复习思考题，共计18课。徐特立在《植棉经验说明》中对江西的气候和土壤情况进行了充分的调查。如，基于瑞金清明节气后还会出现霜的情况，他提出棉花要提前下种，最迟不能晚于谷雨节气。精心编排的教科书，既切合苏区实际又适合教学需要，为学校提供了很好的教学基础。

为破解苏区现实困难贡献力量

中央农业学校办学具有突出的问题意识，一切教学和研究都围绕革命根据地建设来开展。学校响应党和苏区政府号召，密切关注革命根据地建设中的问题和困难，为破解这些难题贡献力量。

为了消灭封建残余势力，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巩固苏维埃政权，从1933年2月开始，中央苏区开展了广泛深入的查田运动。为了纠正运动中的偏差，推动查田运动科学正确的开展，中央农业学校于1933年11月印发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编写的《土地问题》学习培训材料，通过培训提高干部在查田运动中的科学决策能力。材料指出：“正确的解决土地问题是苏维埃运动的中心问题。”材料围绕土地革命的重要意义、土地革命的路线和策略、查田运动等问题作出具体阐释、提出理论依据并给予方法指导，要求参与查田运动的干部正确分析阶级和广泛发动群众，“以工人为主导，依靠贫农，联合中农，削弱富

农，消灭地主，使土地革命的利益完全落在中农贫农工人身上”。经过培训，苏区干部对中国革命中的土地问题形成了正确认识，更为科学地把握了中央土地政策的原则和查田运动的要领，减少了运动中的偏差，很好地调动了群众积极性，巩固了苏维埃政权。

1934年1月，在筹备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际，中央农业学校学生与工作人员作出充分准备，以实际行动体现对二苏大会的拥护。校学生委员会召集全体同学开会研讨，经过热烈讨论，决定成立三个组织。一是宣传队，围绕扩大红军与归队运动、节省经济发展生产、充实红军给养、争取反“围剿”战争全部胜利等展开宣传。二是耕田队，帮助红军家属耕田。三是募捐队，当场募集到大洋二元，并决定在散会后继续开展募捐工作。

中央苏区时期，国民党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实施经济封锁，禁止商品在白区与苏区之间流通，致使苏区布匹短缺，干部群众的穿衣成为现实问题。为此，中央农业学校将植棉问题作为重要问题来破解。当时中央苏区农民群众没有植棉的经验，学校没有植棉专业的教师，也没有专门的书籍。徐特立就带领师生在实验中摸索，经过大半年的尝试，“关于植棉的早涝问题、品种问题、施肥问题、整枝打叉问题、播种期成熟期问题，我们取得很多的经验”。1934年7月21日，第217期《红色中华》刊发了《加紧棉花的培植工作！》一文，报道中央农业学校学生通过调查发现苏区植棉运动中存在的问题及形成的8个原因，并提出7点具体解决方法。此外，徐特立还亲自指导教员研制成轧棉机。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夕，中央农业学校停办。在一年半多的时间里，学校培训了一大批农业建设干部和技术人才，开展了一系列农业科学研究，为苏区农民群众提供了农业经验和技术支持，为解决苏区的实际困难付出了努力，为保卫苏区革命政权贡献了力量。

红色记忆

《诗经》中的君子之风

□ 陈力 卢宁

作为中国最古老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全方位、多角度地反映了从西周至春秋的历史发展与文化状况，可从中管窥上古社会风貌。《诗经》里的诗篇涵盖了诸多社会角色，“君子”便是其中之一。在《国风》《小雅》与《大雅》等篇章中，共有63首诗，提及“君子”一词近190次。不同篇章中的“君子”身份不同，既有代表贵族的统治者，也有品德高尚之人，还有被女子倾慕的男子。但是他们都有一些共同的品格特征，那就是有学识、有道德、有教养。

以端庄谦敬为规范的礼仪风度

仪态端庄是君子修养的基本要求之一，君子应仪表端正，举手投足之间都要合乎礼仪规范。《曹风·鸣鹄》曰：“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一兮，心如结兮。”这里的“仪”指的是君子外在的威仪，包含了个人仪表、举止风度以及礼仪做派等一系列综合特征，一般通过君子的仪容举止及衣服配饰表现出来，例如《秦风·终南》中“君子至止，黻衣绣裳。佩玉将将，寿考不忘”等。值得

注意的是，《诗经》中凡是提及“君子”，多用“乐胥”“乐”“岂弟”等字眼进行修饰，如《小雅·桑扈》中“君子乐胥，受天之祜”、《周南·樛木》中“乐只君子，福履绥之”、《小雅·蓼萧》中“既见君子，孔燕岂弟”、《小雅·湛露》中“岂弟君子，莫不令仪”等等，“乐胥”“乐”“岂弟”都有和乐乐、平易宽厚的意思，旨在赞许君子风度翩翩、谦敬辞让。总的来说，君子在朝堂上要气度雍容，在庙堂上要庄敬严肃，在宴席上要平易近和，只有这样才处处彰显君子风范。

以诗书才学为基础的文化素养

通达诗书，往往是君子之风的标配。对于一位君子的成长来说，学习

是摆在首要位置的事情，对于君子品格的养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诗经》中很多篇章都塑造了文采斐然、钻研学问的君子形象。《卫风·淇奥》是《诗经》中深度描写君子的代表作品，树立了君子由内及外的风采，其中有“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一句便是对君子（此诗指卫武公）认真钻研学问的描写。“切”“磋”“琢”“磨”，本义指对于玉石骨器进行精细加工，引申为卫武公在钻研学问的时候像加工玉石骨器那般刻苦仔细。《小雅·裳裳者华》中有“我覯之子，维其有章矣”一句，描写了一位才华横溢、富有教养的华服青年，《小雅·都人士》中赞许君子“其容不改，出言有章”，即言语雅致，出口成章。《小雅·桑扈》中“交交桑扈，有莺其领。君子乐胥，万邦之屏”，用青雀颈间的羽毛来比喻有才华的君子足以使国家安定和

乐。周代的君子大多是各个诸侯国的贵族阶层，社会地位较高，这使得他们得以接受良好的教育，君子们往往通过勤勉学习来通达圣贤义理，达到进德修业、治国安邦的目的。

以仁爱忠信为核心的道德境界

在周代，君子作为政治地位的概念不断淡化，其道德内涵不断凸显，为后世淬炼和锻造纯粹的君子品格奠定了基础。在《诗经》中，赞颂君子，最重要的是要肯定其品德修养。《小雅·鹿鸣》云：“视民不佻，君子是则是效”，意思是君子仁爱宽厚才能给众人做榜样；《大雅·卷阿》中“有冯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岂弟君子，四方为则”，指出君子应当有孝心、有德行；《小雅·小弁》

中“君子无易由言，耳属于垣”，倡导君子应当言而有信，不轻易许诺，承诺一旦出口，就不能反悔。由此可见，无论是宽厚爱民，还是忠悌孝信，都应当是君子具备的内在品德。在周代，还有一个文化现象，即将玉石的特性与君子的内在品德联系起来，《礼记·聘义》中就有“君子比德于玉”的说法。以美玉比君子的修辞用法，在《诗经》中也随处可见。《秦风·小戎》曰：“言念君子，温其如玉。”这是一首女子思念征夫的诗歌，此处的“君子”是女子从军的丈夫，“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是赞美其夫君温然如玉的高尚品格。由此可见，君子之所以备受爱戴和赞许，不仅是因为身份地位的尊贵，更是因为其具有善良仁厚、质朴孝信的道德品质，君子的品质是内在美与外在美的统一，是内在修养与外在风度的有机结合。

以安邦定国为追求的英雄风范

周代战争频仍、民不聊生，作为统治阶级的贵族，自然担负起了征伐作战、保家卫国的重任，因此周代尚武之风盛行，士人们大多孔武有力，英姿英发。《诗经》中很多君子都是武士形象。《小雅·车攻》曰：“之子于征，有闻无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此诗赞颂周宣王意气风发的雄姿。《秦风·终南》曰：“终南何有？有条有梅。君子至止，锦衣狐裘。”诗中的“君子”指秦国的初代国君秦襄公，赞美其临危受命，骁勇征战。《唐风·扬之水》曰：“素衣朱襮，从子于沃。既见君子，云何不乐？”描写了将士们整装待发跟随将领奔赴疆场的雄阔画面，彰显了将士们保家卫国、抵御外敌的英雄气魄。总之，《诗经》中的君子多富有家国情怀和担当精神，对于国家的兴衰荣辱肩负着重大责任，这种勇武敏行的气概、慷慨激昂的英雄情怀令人敬重。

文化剪影



母亲的故事

□ 贺彦彬

1909年2月3日，在陕北清涧县解家沟乡王家城村，随着一阵哇哇的哭声，一个女婴在窑洞中降生了。33年后这个女婴成了生我养我的母亲——王希平。

她是村里出了名的巧姑娘，织布缝衣、做饭养蚕、剪纸绣花样样都行。1924年2月，她嫁给了大马家山村一个叫贺生春的读书郎。在三个妯娌中，母亲年龄最小，但她特别聪明能干。在家族中遇到精细复杂的家务活，往往都是她带着两个兄嫂共同完成。村里的婆姨们想剪个窗花呀，铰个鞋样呀，做点细致的针线活，也都愿意让她帮忙。因此，母亲在父老乡亲们中人缘很好，经常得到大家的称赞和好评。

我的父亲贺生春1908年出生于清涧县大马家山村，虽然家境贫寒，但他从小刻苦读书，后来考入了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学习期间他接受了党的教育，接触和阅读了一些马列主义常识读物，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27年，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白色恐怖中，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父亲以小学教员为公开身份，从事党的地下斗争，并在绥德、清涧一带发动农民运动，开展武装游击战争。

1934年，受父亲革命思想的影响，母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身为村里的妇女委员，她协助父亲做了大量革命工作。父亲和战友们在家里开会时，母亲就站在村口，边纳鞋底边放哨。她还是“鸡毛信”工作队的成员，负责传递革命信息。为了支援红军，她担负起了组织妇女做军鞋的任务。当革命转入公开化后，她又带领妇女大唱革命歌曲，动员和欢送村里的青年人入伍当红军。有一次，一个叛徒带人到村里抓我父亲扑空后，要把我哥抓走，多亏母亲先将我哥藏在了村里最偏僻的一户人家，才免遭不幸。还有一次，母亲背着襁褓中的大姐，一手拉着哥哥近距离遇到下乡“围剿”的敌人。母亲怕女儿的哭声惊动敌人，急中生智磕碎地里的一个西瓜，掰下一块塞进女儿嘴里，才化险为夷。

1947年，胡宗南部进犯陕北。母亲带着奶奶、二姐和我，东渡黄河住在山西的一户人家。那时我只有5岁，还记得当天晚上，房东熬了一锅小米粥给我们吃，忘了是谁不小心将滚烫的米粥淋在了我的左脚背上，疼

得我号啕大哭，此事令我至今难忘。

新中国成立后，母亲带着我和二姐住在西安。父亲时任甘肃天水地委书记，不在西安，我和二姐被送到西北保育小学，过上了有学可上的美好生活。母亲还积极参加扫盲识字，学会了用注音字母查字典。1952年，母亲送我大姐入朝参战，彰显了母亲的革命胸怀。

母亲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她的党性很强，终生爱党爱国，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始终维护党和国家利益，时常教育我们要永远跟党走。

1999年9月4日，母亲过完她91岁寿辰后安详地走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如今，我想对母亲说，敬爱的好妈妈，您受尽了旧社会的苦难，为革命事业和家乡解放贡献了毕生的精力，您称得上是一位革命的好母亲。

母亲，我永远爱您，怀念您！（作者系原中央党校图书馆副研究馆员）